

《吕氏春秋》

的政治哲学研究

——以天人关系为中心

杨汉民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杨汉民，男，湖南祁阳人，2012年毕业于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湖南衡阳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中国伦理思想史与思想政治教育方向的研究，先后主持湖南省高校科学研究优秀青年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湖南省情与决策咨询研究项目、衡阳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及衡阳师范学院科学基金项目等，并在《史学月刊》《理论月刊》《社会科学家》《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20余篇论文。

《吕氏春秋》的政治 哲学研究

——以天人关系为中心

杨汉民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吕氏春秋》的政治哲学研究：以天人关系为中心 /
杨汉民著.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5482-2276-7

I. ①吕… II. ①杨… III. ①《吕氏春秋》—政治哲
学—研究 IV. ①B229.24②D09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5693号

责任编辑：赵红梅

装帧设计：郑明娟

《吕氏春秋》

的政治哲学研究

——以天人关系为中心

杨汉民
著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市研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3

字 数：244千

版 次：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2-2276-7

定 价：36.00元

社 址：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650091

电 话：(0871) 65031071 65033244

网 址：<http://www.ynup.com>

E-mail：market@ynup.com

序

汉民的博士论文《〈吕氏春秋〉的政治哲学研究——以天人关系为中心》即将出版，要我作序，作为指导老师，这是我的责任，也是义务，故为数语，以荐时贤。

众所周知，《吕氏春秋》是“杂家”的代表作，“杂家”是汉儒划分的十家之一，从学理上说，既然成家，自有其理论体系，理应受到和其他诸子相同的看待。但是，长期以来，和其他诸子相比，学界对“杂家”的研究是不够的，对《吕氏春秋》的研究尤其不够。

从历史的角度看，传统学者忽视《吕氏春秋》的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有其历史原因，一是因为该书是吕不韦集中诸多学人共同编撰，而吕不韦出身商人，执掌秦政，实属投机，其养士是鉴于四公子养士名动天下，感到“以秦之强羞不如”而招徕士人，其目的是自高身价，其编纂图书，名为《吕氏春秋》，不仅要和《春秋左氏传》《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齐名，而且有和孔子《春秋》分庭抗礼之意，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二是该书成书于秦，在统一前夕完成，而秦朝二世而亡，《吕氏春秋》是挟吕不韦个人权力和秦的国势而成书，随着吕不韦被贬而死和秦朝的灭亡，自然是昙花一现。在儒学政治化、经学化以后，学者们专注于经学，当然不会注意《吕氏春秋》的思想内涵。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0世纪之后，经学思维随着社会的裂变而分解，人们逐步走出经学，用现代史学的眼光审视诸子，开始重新认识《吕氏春秋》的价值，特别是郭沫若《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面世以后，打开了认识吕不韦和《吕氏春秋》的新境界，人们开始从历史、思想、哲学、文化等不同层面分析吕不韦、《吕氏春秋》及其代表的杂家学说，吕不韦的历史地位、《吕氏春秋》的历史内涵逐步地进入学人的研究视野，开始回归其历史坐标之中。但是，现有认识大多是就文本论文本，就思想论思想，没有把吕不韦之编纂《吕氏春秋》置于当时的历史场域考察其价值，对《吕氏春秋》历史内涵的认识与其实际意义存在着较大距离。

《汉书·艺文志》曾概述“杂家”的特点是“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羨而无所归心”。所

谓“兼儒、墨，合名、法”就是采集各家之长，是“国体”所必需，是为了“王治”的需要，是以“王治”贯之而成家。班固列举杂家著作二十家四百零三篇，这都是“王治”的需要，尽管有着“及荡者为之，则漫羨而无所归心”之弊，但是，以《吕氏春秋》来说，其编纂主旨显然不存在“荡”的问题，是以“王治”以一贯之。这里的“王治”是儒、墨的“圣王之治”。吕不韦在《吕氏春秋·序意》借“良人请问十二纪”之口，说“尝得学黄帝之所海颡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在这里，吕不韦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就是为即将亲政的嬴政设定一个治理天下的政治纲领，希望嬴政能像颡顼事黄帝那样把《吕氏春秋》的政治蓝图变成现实，实现王者之治，其八览、六论、十二纪的篇章结构就是“王道”的展示，儒、墨，名、法、阴阳等学派的主张在“王治”之下统一起来了。这种统一不仅是诸子具体主张的有机组合，更主要的是在天人合一之下完成的，其政治蓝图是天意的体现。所以，就“王治”而言，《吕氏春秋》的内容是其他任何一家所无法比拟的，超越了任何学派的门户之见，而高出诸家。班固根据刘向、刘歆的《七略》编撰《艺文志》，他们都是经学家、史学家，都是大学者，他们对各家各派的概括是后人研究诸子的历史坐标，对杂家、对《吕氏春秋》也是如此。

正是鉴于《吕氏春秋》思想的丰富和厚重，鉴于学界研究的不足，汉民将《〈吕氏春秋〉的政治哲学研究——以天人关系为中心》作为学位论文题目。我以为，汉民的论文著作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可得学界重视。

第一，在方法上，将历史学和哲学相结合，用历史的眼光考察哲学命题的历史内涵，用哲学思维分析历史现象的逻辑联系。本书不是就文本论文本，而是把《吕氏春秋》的成书置于秦思想和政治实践的历史长河中说明其成书于统一前夕的秦国有着历史基础，并非如以往认为的是吕不韦个人权势作用的结果。

秦崛起西陲，染有戎人之俗，在秦穆公的时代，曾经受到东方大国以及周王的礼遇，但是随后国势渐衰，降至战国前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东方大国所鄙视，“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商鞅变法之后，一跃而成为七雄之首，挥师东进，所向披靡，被策士和部分学者主要是儒家学者视为虎狼之国，在文化上，除了法家的刑罚，乏善可陈，和东方各国的百家争鸣相比，自然是文化沙漠。这是长期以来，人们认识秦思想文化的前提。这是不符合秦国历史实际的。且不说秦穆公时代东方各国并没有以夷狄视秦，就以商鞅而论，其变法所行固然是“霸道”，以法治国，但是商鞅同样熟稔“帝道”“王道”之学，学者们津津乐道的帝道、王道的诸多内容就包含在商鞅所立的法条之中，这些已经为出土资料所证明。其治国特点是为了霸业兼收并蓄，活跃于秦国政治舞台的不仅仅是法家传人，起码还有着墨家传人，至于纵横家自不待言，用荀子的话说就是

“驳而霸”。荀子曾到秦国考察，所见的秦国政治、民风都是当时最好的，所以荀子说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这个“数”的内涵是丰富的。而荀子入秦，本身就表明了秦文化成就绝非时人所认为的那样“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显然，只有厘清历史真相，才能把握《吕氏春秋》的现实基础，才能历史地解释当时学人何以云集咸阳，抛弃学派之见，编撰出体例完整、思想一致的“杂家”代表作。在这方面，汉民的论文从历史的层面，作出了自己的探索，不仅揭示了《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的历史基础，而且在如何分析思想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有着方法的启示，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以天人关系、天人合一为主轴，有助于深入理解《吕氏春秋》思想史价值。对于《吕氏春秋》的指导思想，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或者以为是道家，或者以为是儒家，或者以为在哲学上以道家为主、在政治伦理上以儒家为主，或者以为就是“杂”，谈不上什么指导思想。本文跳出传统认识的门户藩篱，以天人关系、天人合一为主轴，不仅揭示了《吕氏春秋》的哲学主线，也反映了其时思想界的一般特点。

天人关系是先秦思想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核心问题，司马迁写《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纲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历史实践的逻辑结果。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时代，人的生存靠天吃饭，天人关系不仅是思想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认识天、了解天是生存的必须，天命笼罩人生成为历史的必然。春秋以降，社会裂变，传统天命观随之改变，但是人们只是重新思考天命，赋予天人关系以新的内容而已，天人关系依然是各家各派共同关心的话题，只是人们在讨论天人关系时较多的注重人的因素，更多地强调人对天的体认，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思想维度下思考天人关系。

秦人建国虽晚，但秦人和夏人、商人、周人是同样古老的部族，其文化传统悠久，有着自己特点的天命观念。所以当周室衰微、因护送平王东迁而获得诸侯资格时，秦人便以为是天命使然，出土秦公钟“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或（国）”云云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一方面为自身的奋发图强提供动力，另一方面也为自身的作为提供正义依据。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壮大势不可挡，至吕不韦执政，统一天下指日可待，无论对秦持什么样的政治态度，面对天下即将统一于秦的现实，都必须重新思考其原来的思想主张，从天命的层面解释秦兴起的原因，同时借天命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所以不约而同地把天人关系作为思考的主轴，并希望作为执政的实践指导。这是《吕氏春秋》天人合一理论体系的基础，也是我们认识《吕氏春秋》思想价值的出发点。汉民的论文，正是立足于此，可补已有研究的不足。

其三，对《吕氏春秋》“王治”思想的分析，有助于对先秦政治思想的认识。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引《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一语，谓“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这六家实际上是先秦诸子的代称，“务为治者”不仅仅是这六家，其余诸子也都是“务为治者”，只是其“务为治者”不若这六家有影响而已。所谓“治”即治理，即如何治国、如何使乱世走向治世，治世的最高境界就是行王道，即王者之治。因为通往治世的路径不同、治世的特点各异，而有派别之分，但是实现“王治”则是共同的追求。但是，战国诸子是站在不同立场阐发自己主张的，目的是说动人君按照自己的主张行事，有着特定的利益诉求，因而并没有“同归而殊途”的自觉，相反是党同伐异，彼此攻讦，尽管在争鸣过程中彼此吸收，但并不承认对方的合理性，即使如稷下学宫，学者们也是各唱各的调，各喊各的号，因此稷下学宫学术虽然兴盛，却没有形成成体系的著作。就是因为其时没有哪一个学人、哪一个学派能够统领各派，没有一个共同自觉的纲领能够贯穿各派、使各派放弃长期形成的门派之见。即使博学如荀子，虽然三为祭酒，也不能把大家集中于某一思想体系之中。而《吕氏春秋》以高屋建瓴之势，以“王治”为纲，把各家各派组合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简单地以“杂”的眼光视《吕氏春秋》的思想史地位，也只有抓住这一点，才能深入地把握《吕氏春秋》以及先秦思想家们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才能深入把握先秦诸子的思想共性。以往研究对此认识不足，对《吕氏春秋》政治思想系统性的分析自然有局限。本书抓住了这一轴线，对《吕氏春秋》“王治”思想的内容极其历史基础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分析，无疑有助于深化《吕氏春秋》的思想史、政治史地位的认识。

本书以天人关系为中心，对《吕氏春秋》的政治哲学进行了系统阐释，除了以上所提到的几个方面以外，对战国时代士人价值观的变迁、《吕氏春秋》与历史实践的关系等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所有这些，有的是对前贤时哲的补充，有的则是作者的发现。这些看法，不一定正确，仅是一家之言，随着研究的深入，认识自然会改变。但是，从历史实践的层面考察思想的共性与个性、把握思想史的变迁历程，无疑是科学的方法、正确的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我本治战国秦汉史，偏重于社会结构、制度变迁，与思想、哲学虽然有所思考，也有一些论著，但是总以为是历史学著作，至多是思想史之书而已，不敢以治哲学自诩，所以，就中国哲学学科而言，充其量是初窥门径。好在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思想与哲学更是混而为一，既然谬称导师，只能以导师兼学友的身份，对汉民的论文著作做如上介绍。因为习惯了史学的思

维，所以较少哲学的轻灵，偏于史学的滞涩，同时难免王婆自炫的痼疾，尚请读者原谅。

不过，对汉民之书的学术价值，学者虽然会各有判断，但上述诸点大体是站得住的。

臧知非

2015 年 6 月 3 日于苏州大学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吕氏春秋》编纂成书的思想基础	(14)
第一节 战国社会变革与学术思想的繁荣	(14)
一、兼并战争的加剧和政治格局的变换	(15)
二、封建官僚体制的建立和士人阶层的活跃	(18)
三、从“道术为天下裂”到诸子百家的融合	(21)
第二节 《吕氏春秋》编纂于秦国的历史基础	(22)
一、秦国的崛起与吕不韦的执政	(23)
二、秦国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奠定了《吕氏春秋》的历史基础	(25)
三、战国士人价值观的转变构成了《吕氏春秋》的学术基础	(32)
第二章 《吕氏春秋》天人关系论的凸显及其思想渊源	(40)
第一节 《吕氏春秋》凸显天人关系的历史背景	(40)
第二节 《吕氏春秋》天人关系论的思想渊源	(44)
一、“天”之思：天道自然之和諧	(44)
二、“人”之价值觉醒：社会秩序之构建	(50)
三、和谐与秩序：“天人合一”思想的发展及其重要性	(55)
第三章 《吕氏春秋》的天人关系及其对战国诸子的批判吸收	(60)
第一节 《吕氏春秋》思想体系中的“天”与“人”	(60)
一、“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的宇宙生成论	(61)
二、“天”的多重含义及其相互作用	(65)
三、“阴阳之化”之人及其“达生死性命”的人生价值观	(69)
第二节 人法天地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方式及其理想境界	(79)
一、《吕氏春秋》人法天地的指导思想及其结构体例	(79)
二、《吕氏春秋》人法天地的基本原则	(83)

三、人法天地的主要方式——天人感应	(100)
四、人法天地的理想境界——“阴阳之宜”而“全其天”	(103)
第三节 “天人合一”的政治宇宙图式	(112)
一、从“天人合一”中寻求政治存在的意义	(113)
二、“天人合一”政治宇宙图式的主体框架及其内在联系	(114)
三、“天人合一”政治宇宙图式的文化意义	(120)
第四节 《吕氏春秋》对于诸子天人关系说的综合及其特点	(123)
一、《吕氏春秋》对于诸子天人关系说的综合	(123)
二、《吕氏春秋》天人关系论的特点	(132)
第四章 《吕氏春秋》天人关系模式下的“王治”目标	(144)
第一节 “殊途而同归”与战国诸子“王治”思想的演变发展	(145)
第二节 《吕氏春秋》的“王治”目标及其对战国诸子的综合与超越	(150)
一、着眼于政治操守与智慧的君臣关系论	(150)
二、德主刑辅的政治模式	(154)
三、刑名之术——王者之治的重要手段	(160)
四、义兵之说——王者之治的必然选择	(166)
余论：《吕氏春秋》政治思想的历史实践及其影响	(171)
一、《吕氏春秋》政治思想的历史实践	(171)
二、《吕氏春秋》政治思想的影响	(177)
参考文献	(184)
后 记	(197)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研究意义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召集门客集体编纂的一部体例整齐、内容丰富的传世巨著。该书集诸子百家学说之大成，并严格按照十二纪、八览、六论的结构顺序来阐发各种政治理论，且有“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的指导思想，“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①，“将欲为一代兴王之典礼”^②，旁征博引，蔚为大观。纵观全书，其突出强调的即是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经常探讨的一个理论话题——天人关系。天人关系作为中国古代思想界十分关注的一个基本论题，这已成为当前学界共识和理论之重点。“历代哲学家无不把‘穷天人之际’作为他们思想学说的基本内容与最高目标。无论是商周之际的‘以德配天’，《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还是孟子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荀子的‘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制天命而用之’，直至宋明的‘性天一理’，王夫子的‘尽人道合天德’，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天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折射出古代哲学家对于天人问题的极大关注。”^③因此，以天人关系为中心，从政治哲学这一角度来考察《吕氏春秋》，不仅可以把握该书的思想发展脉络，同时也有助于理清其综合并超越战国诸子的理论方法及其成就。

战国时代，列国之间的政治、军事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因此富国强兵成为各国诸侯的唯一愿望，治国之道遂成为时君世主最迫切的需要和最感兴趣的话题。在这样的时代要求推动下，思想家们加快了理论创造的步伐，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亦随之进入了一个加速度发展的百家争鸣时期。战国时代作为中华帝国的形成期，自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历代王朝在根本上只不过是继承战国时代所形成的各种结构而已。也就是说，政治、经济上的各种重要制度，皆是在蹈

①（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54页。（后文所引该书只注明题名、卷次、页码）

② 陈澧：《礼记集说》，中国书店1994年版，第148页。

③ 卞孝萱：《刘禹锡〈天论〉：“究天人之际”的新篇章》，《光明日报》2002年5月14日，理论周刊。

袭战国时代各种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而已。同样，历代的学术和文化也可以理解为对战国时代学术和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因此，战国时代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直波及至今。而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对于先秦文化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总结，不仅上承先秦诸子，同时下启汉代学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甚至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史上，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时至战国晚期，政治上趋于统一，学术思想亦由分化、争鸣逐步走向融合与汇通，因此当时诸子各派的思想大都体现出这一特色。如从人物来讲，法家韩非集法、术、势于一体并兼采道家老子哲学，儒家荀子“隆礼重法”而集各家思想之大成等；如以学术中心而论，齐国的稷下学宫表现得较为突出，司马光曾著《稷下赋》并称其为“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①。也正是因为当时大批知名学者的聚集与交流，从而有了《管子》这样综合性著作的出现。后来学术中心转移至秦都咸阳，秦相吕不韦效法战国四公子而广纳天下贤能之士，并集众多门客之努力而编纂了《吕氏春秋》一书。该书强调破除成见，取诸子百家之长而弃其短，吸收的同时进行了改造创新，从而构建了一个贯通天地人的庞大理论体系，进一步形成了兼容综合的思想特色，是为杂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作。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记载：“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上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②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又言：“不韦迁蜀，世传《吕览》。”^③《汉书·艺文志》“杂家”目中，班固于《吕氏春秋》下注云：“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④东汉高诱在其《〈吕氏春秋〉序》中又言此书“大出诸子之右”^⑤。上述这些学者及其作品距《吕氏春秋》的编纂年代均比较接近，并对此书持如此褒扬的态度，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随着学界对《吕氏春秋》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此书在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得到肯定。如许维遹在其《〈吕氏春秋〉集释自序》中说：“夫《吕览》之为书，网罗精博，体制谨严，析成败升降之数，备天地名物之文，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之妙义，虽未必一字千金，要亦九流之喉

① 《司马温公文集》卷十二《稷下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9页。

② 《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第365页。

③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2494页。

④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1页。（后文所引该书只注明作者、书名、卷次、页码）

⑤ （汉）高诱注：《吕氏春秋》，上海书店1986年版，序言第2页。（后文所引该书只注明作者、书名、卷次、页码）

襟，杂家之管键也。”^① 郭沫若曾指出：“然而这书却含有极大的政治上的意义，也含有极高的文化史上的价值，向来学者似乎还不曾充分的认识。”^②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说：“《吕氏春秋》是一部奇书，与它的前人和同时代学者的著作相比，其内容与形式都有独到之处。”^③ 熊德基《重评〈吕氏春秋〉》认为该书是“一部符合时代潮流的政论书”^④，张立文主编的《中国学术通史》还言该书为“学术史上继往开来的力作”^⑤等。上述言论虽然出发点未必一致，但都同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吕氏春秋》所存在的思想价值。然就实质而言，《吕氏春秋》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并不仅仅在于其对当时诸子学说的归纳和传承，更重要的还是其积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统一诸子各家思想的种种努力及其具体做法，从而将战国学术推向了一个融合、汇通的新境界。

众所周知，《吕氏春秋》作为杂家的主要特点就是综合诸子百家。该书对儒家孔、孟、荀的思想均有继承和发展，对道家老庄关于道和无为的思想进行了改造利用，论述了墨家思想存在的局限，并指出秦国法治之不足，辨析了邓析、惠施与公孙龙等名家无用于世的诡辩，也比较全面地借鉴了稷下黄老之学的理论成果，是“一部独一无二的晚周哲学思想的文集”^⑥。可以说，《吕氏春秋》对战国社会广泛流行的各种学术思潮都进行了全面回应，并且与众不同的一点还在于，该书特别突出天人关系的重要性并在“天人合一”模式之下开辟了融汇各家学说的新途径。《吕氏春秋》强调天道与人道在本原、本体基础上合一的前提之下^⑦，论述了君道与民本相统一的观点，权衡了德治与法治之间的主次关系，并集中总结了伦理道德的有关原则与规范，指出了任贤在政治上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也强调了因时变革的重要性等，当然这一切之主要目的皆在于明确实现“王治”社会的最高目标以及与此相应的种种治理措施。《吕氏春秋》能够兼采各家之长并自成体系，从而形成了综合汇通之中又有提升的思想特色。虽然战国时代诸子综合汇通的结果并非杂家一派，且每一家都可能以地理的、政治的、思想的

①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页。（后文所引该书只注明作者、书名、卷次、页码）

② 郭沫若：《十批判书》，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第294页。

③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④ 熊德基：《重评〈吕氏春秋〉》，《江汉论坛》1979年第4期。

⑤ 张立文主编：《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⑥ [英]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⑦ 孙以楷等认为：“《荀子》侧重强调天人相分以及在后天实践中所达到的天人统一，而《吕氏春秋》则更侧重强调天人在本原、本体上的合一。”参见孙以楷主编《道家与中国哲学·先秦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82页。

多方因素作为背景,有的表现为理想,有的表现为实践总结,也有的是现实设计等,但大多存在学派执见以及思想结构上的偏失,如荀子、韩非之流在批判诸子各家时,都比较明显地站在自身学派的立场来把握各家思想的取舍,然而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能够针对秦国的历史和现实实践,同时适应战国社会总体发展形势,对待诸子各家不仅较为客观和公正,其理论体系也显得更加周全。

《吕氏春秋》承前启后,是处在历史转折点上的总结性巨著。该书贯通天人而囊括诸子的各种政治和伦理学说,拟为“王治”社会也就是大一统政治服务。在这里,王道和霸道是统一的,人事和自然是统一的,秦国传统和东方六国传统也是统一的,当然这是站在新的高度来认识秦与六国的文化传统而后统一之。这种统一的意义是非凡的,它是《吕氏春秋》的编纂者对即将到来的大一统政治的文化自觉,也是区域文化的大汇通,尽管这个汇通是理论上的,距离政治实践还有相当长的距离,但对于秦汉政治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目前学界对于《吕氏春秋》的研究成果为数不少,但大多是从考据学、历史学、哲学或伦理学等角度展开的,并且陈陈相因的东西还较多。虽然也有部分学者注意到《吕氏春秋》的政治思想及其价值,但基本局限于秦相吕不韦与秦王政之间的利益关系及其服务于大一统政权的各种政治主张,而结合《吕氏春秋》所强调的天人关系并从政治哲学这一角度来对该书的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还不多。政治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主要探讨人类社会政治生活最根本性的问题:“也就是每一历史时期的思想家对于社会生活所做的应然判断。在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围内,人们所讨论的主要是有关社会生活的应然性问题,而不是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描述,或者说,政治哲学所讨论的问题不是现实的社会生活‘是什么’(to be)的问题,而是人类社会生活‘应该是什么’(ought to be)。”^①可见政治哲学是一种价值追求而不是一种事实判断,它反映了人们对“善”的向往。^②而《吕氏春秋》以“王治”为目标而博采众家之长,主要原因就在于适应现实的政治形势和政治需要,充分体现了该书编纂者对于优良之政治生活的追求。作为杂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作,对于《吕氏春秋》的研究可谓一个长久的课题,所以本书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对《吕氏春秋》的天人关系及其政治内核展开进一步的探讨,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以期求得学界

① 孙晓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上),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2页。

② 周桂钿等认为:“从先秦诸子来看,求善的政治哲学家占多数。在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中,求善的政治哲学成为正统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指导思想,也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深刻地影响到全民族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主干。”参见周桂钿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页。

各位同仁的指教。

二、《吕氏春秋》思想研究历程与现状分析

在中国学术史上,《吕氏春秋》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地位曾长期不被看好,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冷落局面才有所改变,遂对其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

自《汉书·艺文志》以来的历代书目中,都曾把《吕氏春秋》列为子部杂家类。虽然历来学者对于何谓杂家有着不同的理解,也并非一概视之为“漫羨而无所归心”^①,但《吕氏春秋》杂糅各家的风格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们的正确认识,加上汉初“过秦论”思潮的影响以及主编吕不韦个人名声的牵累,遂致该书的思想价值曾长期处于被轻视的境况。所以汉以降的历代学者对于《吕氏春秋》都未曾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至近代该书又因其“杂”而备受冷遇,在许多学者看来不过是史料汇编,毫无思想可言。如梁启超认为:“吕览儒墨名法、樊然杂陈,支相违忤,只能为最古之类书,不足以成一家言,命之曰杂固宜。”^②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自序中称:“凡无中心观念之著述,即所谓杂家之书,如《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不可为哲学史之原始的史料,但以其记述别家之言,有报告之价值,可以作为辅助的史料。”^③到20世纪中期,由于社会史和文化史理念的影响,《吕氏春秋》曾引起部分思想家的注意,但该书在一段时间内所获得的评价仍相当低。如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将该书视为战国末年“中国古代思想的没落倾向”中最没落的一支。^④冯友兰后来所著《中国哲学史新编》又说:“《吕氏春秋》的方法不是对各家在更高的水平上加以综合,而用一种拼凑式的方法加以综合……杂家不是在自然、社会、人生中发现问题的,而是在别人的体系中看别人怎么样解决问题……他们没有创造性,他们的体系也没有生命力。”^⑤张岱年虽然曾肯定《吕氏春秋》“杂而不杂,是一个综合学派”,但又认为“它的缺点是没有提出一个独创的中心观点”。^⑥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最近三十年来,随着对早期“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之类学科

①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评论杂家认为“荡者为之,则漫羨而无所归心”。参见《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2页。

② 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载《饮冰室合集》(第十册),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40~41页。

③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④ 参见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56~663页。

⑤ 详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68~474页。

⑥ 参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8页。

的反省与突破，以及由于与《吕氏春秋》存在较大关联的一批古佚书得以问世和公布，《吕氏春秋》的思想研究价值才逐步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①

值得庆幸的是，在《吕氏春秋》曾经备受轻视或冷落的时代，还是有少数学者注意到此书的思想价值，并给予注释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东汉时期的高诱是为《吕氏春秋》全面作注的第一人，明清之际的毕沅曾著《吕氏春秋新校正》，另外民国时期许维遹所作的《吕氏春秋集释》成就也较高。这些都为后人学习研究《吕氏春秋》奠定了基础和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来源。胡适作于1930年的《读〈吕氏春秋〉》，可谓是该书思想研究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大致介绍了该书与吕不韦个人主义之间的关系及其有意综合的思想系统。郭沫若1943年写成的《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一文，比较全面地探讨了该书的时代背景以及吕不韦与秦王政之间的观点差异。虽然这两篇文章的观点并未获得当时主流学界的认同，但是为后来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思考方向以及深刻启示。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吕氏春秋》的研究可谓渐成热潮。据初步统计，迄今为止中国内陆及台湾地区发表论文近300篇，出版注释和研究性著作10余部，论及《吕氏春秋》的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中国政治等方面的通史或断代史著作也有60余部，《吕氏春秋》的思想价值已日益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在学术专著方面具有较大影响的如：王范之的《吕氏春秋研究》，主要通过文献的甄别比较来考察该书的材料来源及其综合思想的构成；牟钟鉴的《〈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把《吕氏春秋》放在战国秦汉思想文化的总体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并予以前后比较，从而认为该书是秦汉新道家的首创之作；刘元彦的《杂家帝王学——〈吕氏春秋〉》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具有杂家性格的儒家文化，而《吕氏春秋》就是典型的杂家代表作；洪家义的《吕不韦评传》认为《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主编的一部完整的政论书，该书以道家的自然主义为指导思想，而反君主专制独裁是其理论重点和精华；李家骧的《吕氏春秋通论》称《吕氏春秋》是一部集先秦诸子精英之大成的学术专著，从而对该书所涉及的各家思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区分和比较；张富祥的《王政全书：〈吕氏春秋〉与中国文化》把吕不韦看作战国末年的大政治家，称《吕氏春秋》事实上是一部展示吕氏学派的“王政”思想和文化史观的论文集；臧知非的《吕不韦传》详细介绍了吕不韦的传奇人生及其招贤纳士而编纂《吕氏春秋》的治国意

^① 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熊铁基：《秦汉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庞慧：《〈吕氏春秋〉对社会秩序的理解与构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